



贾植芳

老人老事

曾仕强

老人老事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老事/贾植芳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 7

ISBN 7-5347-2762-6

I. 老… II. 贾…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507 号

老人老事/贾植芳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霍红琴 王 森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03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 前记

收录在这里的文章,都是我八十岁前后几年所写的零碎文章的结集,其中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怀旧或忆旧性的记人记事的文章,因为正如我在前些年一篇文章中所说,人也上了年纪,由于精力体力的日益下降,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面越来越狭小了,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与了解大都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而是来自众多传媒——报刊专著的阅读,也因此,往往引发出自己对历史生活中的故人、旧事的回忆与思考。另一类是为自己著译或中青年一代著译写的序文。虽然身为教授的职业者,我却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个在时代的风浪中奔波流浪的社会性的知识分子,所以到大学当教授,按我的说法是来“插队落户”,因为从50年代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空间的缩小,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文化体制下,自由职业这一行业又被改造和消除,正如当时流行的通俗性的说法,“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一定的职业岗

位，也失去了择业的自由。这种持续三十多年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直到80年代前后，即“文革”结束，中国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新时势下，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社会生活空间才逐渐扩大。而由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从50年代胡风冤案发生后，我经历了近二十五年的监禁与劳改的漫长生涯，回到“人民队伍”时，已是垂老的年纪，因此，这些学术性的序跋文，是以我的人生际遇和历史感受为底蕴与视角的，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只能说是具有学术性而已。

感谢青年朋友李辉的热情支持，也得感谢青年朋友、在取博士生蔡春华帮我整理编辑这些书稿的辛劳。同时还要感谢大象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同志，他们在去年出版了我的书信集《写给学生》，现在又愿意承印我的这些零碎文章，使它们有了以整体性的面目问世的机会。

收在这里的文章，其中除过我自己执笔写的以外，多是由我口述，一些热情的中青年朋友记录整理，最后由我定稿的文章。这些朋友是陈思和、谢天振、刘志荣、汪凌、钱亦蕉、柳珊、周伟鸿等，现趁成书出版机会，谢谢他们和她们的辛劳与热情，它也是我和中青年两代朋友友情的一个永恒的纪念。

话就说到这里。但愿上苍保佑，它不是我的最后一个文集，希望它还会有续集，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鲁迅先生晚年的各色短文分别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或借用解放后革命干部间流行的一句政治信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那样，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贾植芳

2001年5月初于上海寓所

目录

前 记 贾植芳(1)

1987

◎中国士人之鉴——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札记
(12月) (1)

1989

◎我的难友邵洵美(5月) (4)

1990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10月) (14)

1992

◎书与我(12月17日) (29)

199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
(10月18日) (32)

1997

- ◎“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芳草斜阳忆行踪》序(4月)……………(37)

1998

- ◎皮鞋的故事——暮年杂忆(4月)……………(44)
- ◎纪德《访苏联归来》新译本序(4月)……………(48)
- ◎找回另一只翅膀——《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再版感言(5月10日)……………(59)
- ◎《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序(6月)……………(63)
- ◎一道醒目的历史风景——《上海现代文学史》序(7月上旬)……………(67)
- ◎为姜云生《细读自己》序(8月)……………(69)
- ◎我的两位值得纪念的朋友——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8月)……………(74)
- ◎《鲁迅与高长虹》序(9月下旬)……………(80)
- ◎《在历史的背面》——关于自选集的自序(秋)……………(84)
- ◎向中学生推荐一本书——《西游记》(11月初旬)……………(87)
- ◎探索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为谢天振教授的新著《译介学》而序(11月)……………(90)
- ◎上海是个海(12月)……………(95)

1999

- ◎1979年进京记(1月)……………(118)
- ◎我的祝贺与祝福——为韩国《国际中国学研究》而序(2月1日)……………(142)

- ◎历史的悲剧 悲剧的历史——为刘挺生的《分裂的美人——路翎传》而序(2月)……………(146)
- ◎《给任敏的信(1972—1978)》——写在前面的话(3月)……………(153)
- ◎背影——悼念公木先生(3月中旬)………(156)
- ◎回忆王中(5月)……………(161)
- ◎贾植芳、胡守钧谈鲁迅(5月30日)………(166)
- ◎反思的历史 历史的反思——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序(6月中旬)……………(174)
- ◎《狱里狱外》新版题记(6月下旬)……………(180)
- ◎我看《米舒书话》(6月29日)……………(184)
- ◎我的三个朋友——《契诃夫手记》新版后记(夏)……………(188)
- ◎友谊与感情的结晶——《写给学生》序(7月18日)……………(198)
- ◎兼跨两个领域——《春天的色彩》序(8月6日)……………(201)
- ◎《中国近代散文精萃类编》序言(秋)………(203)
- ◎我与比较文学——应《中国比较文学》约稿而作(10月23日)……………(206)
- ◎两个倔强的灵魂——为秋石新作《萧军与萧红》写序(11月15日)……………(212)
- ◎贾植芳、胡守钧谈胡风(12月)……………(225)
- ◎《解冻时节》自序(12月24日)……………(241)

2000

- ◎新世纪第一天日记抄(1月1日)……………(248)
- ◎我是一条龙(1月30日)……………(251)
- ◎看哪,这人——《尼采在中国》序(2月2日)

- (253)
- ◎《中西比较文化论》序——一部开拓创新的研究
专著(4月8日) (257)
- ◎周作人新论——《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
人的文艺思想》中译本序(6月6日) (261)
-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三朋五友》序(6
月9日) (265)
- ◎孔海珠《“左联”史料新探》序(10月)
..... (268)
- ◎我的读书观(10月) (273)

2001

- ◎《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新版题记(2月12日)
..... (279)
-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3月19日)
..... (283)
- ◎《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序(9月
2日) (289)
- ◎走向大众的美学——《大众美学99》序(10月中
旬) (294)

编后记 蔡春华(299)

1987 | 中国士人之鉴

——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札记

清末以迄“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接触西学,因而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尽管他们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和生活气质不同,但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华,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则是心同理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既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又有别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又是世界的。他们在横向上借鉴了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在纵向上继承和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文化性格和人格素质。在文化建设上,他们除了创造性的著述活动外,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学术的同时,更花了精力,以科学态度钻研、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清其精华与糟粕,他们对中外文化都取“拿来主义”的实际态度。西

方有些现代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总体性研究,把它看成一门新的研究课题,捷克的加里克,美国的戈德曼等都写了这类专门著作。

但传统文化对于清末以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说来,仍然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机制,具有制约作用。最突出的是在人格修养和气质方面的影响。这里既有积极入世,济世救民,“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这些好传统的影响,也有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或自命清高这些消极的名士风、隐逸风和才子风的影响;更有以知识和人格作为赌注,“好官我自为之”的坏传统影响,热衷于“黄金屋”、“颜如玉”的追求,只求一己富贵荣华和光宗耀祖的官瘾患者,他们蝇营狗苟,钻营奔走于权贵之门,卖身投靠,无耻无行。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的“士”认识最深切、观察最透彻的一位清醒的作家和学者。他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我们描绘了清末民初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色相,这里既有孔乙己、陈士成这类仕途热衷者和没落者;更有“狂人”、夏瑜、魏连殳、吕纬甫这类在封建专制重压下经历了觉醒、挣扎、追求、斗争、牺牲以至落荒而走者;也有“假洋鬼子”那样的投机者,涓生那样的“梦游者”……就是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里,我们仍然看到他以如炬的目光,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当的历史评价。他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把这部作品推崇为“足称讽刺的书”,在书中,他在“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的标题下,对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的论述,尤足发人深省。他以精要的笔触对中国士人的种种“富贵梦”的淋漓尽致的剖析,可谓烛照出那种“读书做官”论者所追求的整个理想人生境界。

小说的主人公文素臣，位极人臣，一生富贵风流，享尽荣华。他除过“惟尚不敢希帝王”以外，“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都在那位“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的作者夏敬渠笔下，变成了生活的真实。而这位文素臣大人，他“生平最大的本领”，取得富贵的依据，就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由于他“排斥异端，用力尤劲”，以致非儒以外的“道人释子”等异端，被他诛夷殆尽，“坛场荒凉，塔寺毁弃”，因此才博得了他“素父”及其一家，“嘉祥备具，如万流宗仰”的美满后果。鲁迅先生在这里不仅活画出这个正宗儒者——封建主义卫道士的血腥嘴脸，也无情地揭出了他所以获得尊贵显荣的手段和窍门。他在这里用力剖析了这类“理学家”的心理和行径，我认为实在是用的感时愤世之笔，因为鲁迅在大学讲课和著述此书的时代，类似夏敬渠其人，或如他的梦中化身的文素臣，仍不乏其人，只是程度有所区别而已。这类“理学家”式的“仕人”，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断子绝孙，肥沃的封建土壤，正是生产这种“正面人物”的温床。因此，这个“正面形象”实在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意蕴。

《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成于20年代的学术著作，是关于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部开山之作，它不仅把一向认为不入流的“街谈巷语”之作的小说抬到文学正宗的地位来认识，对中国小说发展史作了系统性的历史描述，它更以其不同凡响的见地而得到海内外学子的推崇。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那样气吞斗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总方向，有了那么伟大正确的指示的，还不曾有第二人。”

1987年12月于上海 载《书讯报》1988年2月1日

1989 | 我的难友邵洵美

我和邵洵美先生相识，纯然是偶然的机遇，虽然从30年代初以来，通过报刊等传播工具已对他相当熟悉了。与他相识的时间记得是在1952年。

那一年，韩侍桁兄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邀请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邵洵美诸位文苑人士，我们夫妇也叨陪末座。那时韩侍桁在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办了一家叫国际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他自行编辑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很想将原来由南京正中书店印行，当时已经绝版的罗先生的旧译《红与黑》收入这个“译丛”重新与读者见面。所以举行这个座谈式的宴会，一来和新老故旧叙情，二来也是请大家

共襄盛举的意思。其中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

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本来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他早期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成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视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由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来了?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押,到了所谓“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来

了。1960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病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给人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菜,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居然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竟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不用医生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即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我在病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8号楼监狱。那个面积长宽六尺,只能住一只老虎的狱室,竟密密麻麻地挤了七个人,还有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放在身旁。这里一天虽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两餐,都发一个犯人称之为“巧克力馒

头”(其实是高粱粉、玉米粉与花生壳的混合品)的杂粮馒头,大约有一两来重,像我这样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饱了,到底比我原来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丰富”多了。

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望着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侍栢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会马上开了门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交代了相互原来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你交代彼此的“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这么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看来他也是个“老鬼”,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 600cc(注:当时犯人以“cc”为计量单位,来估量所领饭食的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着“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

拿出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写着什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的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撂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攒在屋角里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想不到从此我们竟在这间狱室里做了近四个月的“同监犯”，这真如俗语所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从第二天起，监房里陆续来了不少新客，大约有十几个。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国剑桥读过书，原来是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编辑。此人有五十多岁，彬彬有礼，虽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绅士风度。还有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大观园开过一个店名“壶”的咖啡馆，大约是个日本浪人。还有一个台湾人，五十多岁，是上海一家细菌研究所的研究员。其余都是中国大陆上的人，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们都属于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有新式资本家，也有上层官吏，还有天主教的神甫，好在这里只准用番号互相称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姓名，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但时间一久，也多少互知道了一点；同时，监房的人多了，也便于相互低声交谈，一发现走廊有管理员的脚步声，就有人警惕地大声咳嗽打信号，马上就沉默下来了，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最佳的彼此交谈机会是一日三顿饭后，大家排成一队，转着圈“活